

吕著 史学与史籍

吕思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吕著史学与史籍

吕思勉
著



A101781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吕著史学与史籍/吕思勉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5617-2318-0

I. 史... II. 吕... III. 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189 号

吕著史学与史籍

著 者 吕思勉
责任编辑 陈长华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一次

印 数 3500
书 号 ISBN 7-5617-2318-0/K·183
定 价 1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出版说明

《吕著史学与史籍》汇集了吕思勉先生有关史学与史籍的六种著述,它们包括:《历史研究法》、《史籍与史学》、《中国史籍读法》、《史籍选文述评》、《史通评》、《文史通义评》。

《历史研究法》写于抗战胜利之后,1945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初版发行。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历史研究法》收入吕先生的《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民国丛书》,《历史研究法》编入该丛书的第73卷历史地理类。

《史籍与史学》写于抗战之前,原名《史学研究法》,为吕思勉先生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的一篇讲义,全篇分11章,其中第二、三、四、七、八、九、十一章,曾以《史籍与史学》为题,收入吕先生的《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余下的数章,则以《〈史籍与史学〉补编》为题,收入《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现按原稿的编次重新整理,个别改动之处,也按原稿订正恢复。

《中国史籍读法》与《史籍选文述评》是吕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时所写的讲稿,1953、1954年,吕先生为历史系学生开设《史籍选读》与《中国史籍读法》课程,开学不久,他即生病,课不能继续,便于病中写成了这两门课程的讲义,这也是他所写的最后的两部讲稿。《中国史籍读法》曾收入《史学四种》。《史籍选文述评》的述评部分曾收入《吕思勉遗文集》,现按原稿补全,个别删漏的部分也按原稿补正。

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我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代表作。《史通评》和《文史通义评》，是吕先生通过对这两部书的评述来阐述史学方法的著述。《史通评》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35年3月再版。后收入《史学四种》。书成之后，吕先生还曾计划对《史通》作一番评校，后因故未能实现，仅留《评校〈史通〉序》一篇，现以附录的方式，刊于正文之后。《文史通义评》写于抗战之前，也是吕先生任教光华大学时的讲稿，一直没有刊印，20世纪80年代初，收入《史学四种》。在吕先生的文稿中，又有《〈文史通义〉选读提要》一篇，现用作附录二。

除了上述六种之外，有关史籍与史学的著述，读者还可以参阅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的有关章节和《吕思勉读史札记》的部分条目。

目 录

历史研究法

- 一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1)
- 二 历史的历史····· (4)
- 三 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 (10)
- 四 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14)
- 五 现代史学家的宗旨····· (19)
- 六 作史的方法····· (23)
- 七 研究历史的方法····· (28)

史籍与史学

- 一 史学定义····· (37)
- 二 史籍溯源····· (39)
- 三 史学缘起····· (41)
- 四 史部大略(上)····· (44)
- 五 史部大略(下)····· (48)
- 六 史家宗旨今昔异同····· (50)
- 七 史材····· (56)
- 八 论搜辑····· (59)
- 九 论考证····· (60)
- 十 论论史事之法····· (63)
- 十一 史学演讲趋势····· (67)

中国史籍读法

- 弁 言····· (70)
- 一 史学之用安在····· (70)

二 中国有史学么·····	(72)
三 再为中国史学诉冤·····	(75)
四 史权为统治阶级所篡·····	(77)
五 读旧史宜注意之点·····	(84)
附录一 古书名著选读拟目 ·····	(91)
附录二 关于正史(上) ·····	(92)
关于正史(下) ·····	(94)
六 读旧史入手的方法·····	(96)
七 治古史的特殊方法·····	(102)
史籍选文述评	
一、拟目·····	(112)
二、总论·····	(115)
史通评	
内 篇	
六家第一·····	(216)
二体第二·····	(223)
载言第三·····	(223)
本纪第四·····	(224)
世家第五·····	(225)
列传第六·····	(226)
表历第七·····	(226)
书志第八·····	(227)
论赞第九·····	(229)
序例第十·····	(229)
题目第十一·····	(230)
断限第十二·····	(230)
编次第十三·····	(231)
称谓第十四·····	(232)
采撰第十五·····	(233)

载文第十六	(234)
补注第十七	(234)
困习第十八	(236)
邑里第十九	(236)
言语第二十	(237)
浮词第二十一	(238)
叙事第二十二	(239)
品藻第二十三	(240)
直书第二十四	(241)
曲笔第二十五	(242)
鉴识第二十六	(243)
探赜第二十七	(244)
模拟第二十八	(244)
书事第二十九	(245)
人物第三十	(245)
赅才第三十一	(245)
序传第三十二	(246)
烦省第三十三	(246)
杂述第三十四	(247)
辨职第三十五	(248)
自叙第三十六	(249)
外 篇	
史官建置第一	(250)
古今正史第二	(259)
疑古第三	(270)
惑经第四	(280)
申左第五	(281)
点烦第六	(285)
杂说上第七	(295)

杂说中第八	(296)
杂说下第九	(296)
《汉书·五行说》错误第十	(297)
《五行志》杂驳第十一	(297)
暗惑第十二	(297)
忤时第十三	(297)
附录 评校《史通》序	(298)
文史通义评	
序	(300)
易教上	(302)
易教中	(304)
易教下	(306)
书教上	(307)
书教中	(308)
书教下	(309)
诗教上	(311)
诗教下	(313)
经解上、中、下	(314)
原道上、中、下	(316)
原学上、中、下	(317)
博约上、中、下	(317)
言公上、中、下	(319)
史 德	(320)
史 释	(321)
史 注	(321)
传 记	(322)
习 固	(322)
朱 陆	(322)
文 德	(323)

文 理	(323)
文 集	(324)
篇 卷	(325)
天 喻	(325)
师 说	(326)
假 年	(326)
感 遇	(326)
辩 似	(327)
说 林	(327)
知 难	(328)
释 通	(328)
横 通	(329)
繁 称	(329)
匡 缪	(330)
质 性	(330)
黠 陋	(330)
俗 嫌	(330)
鍼 名	(330)
砭 异	(331)
砭 俗	(331)
申 郑	(331)
答客问上、中、下	(331)
答 问	(332)
古文公式	(332)
古文十弊	(333)
浙东学术	(334)
妇学、妇学篇书后	(334)
诗 话	(334)
附录一 章学诚之史学思想	(335)
附录二 《文史通义》选读提要	(338)

历史研究法

一、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有什么用处？

提出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那就是：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的，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姑无论成功失败，不尽由于做法的好坏；众人所谓好坏，不足为准；即置二者于弗论，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之理？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如咸丰十年，僧格林沁把英、法兵打败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说：“咸丰八年，业经把英、法兵打败了，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则他们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不易再来第三次，时局就可望转机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战败

一次,即不易三来?当日清朝腐败的情形,是否再战胜一次,时局即可望转机?我们在今日看起来,可谓洞若观火,而在当日,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这也无怪其然。当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倒也不会作英、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有了历史知识,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而要兴兵至于三次、四次,确是不容易的,无怪薛氏要作此推测了。据此看来,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尝不误事。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深曲隐蔽,不可轻于推测。为什么呢?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未免太浅薄了,所以我有此见解。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尔不过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这话怎样讲呢?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我们和人家谈话,总听得他说:从前如何如何,这就是历史知识。所谓历史,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其知识之相去,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思路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

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

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据历史上的成例，以推断事情，又易陷于错误；而没有历史知识，又要误事；然则如何是好呢？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的，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浅薄的人往往说：我能够应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么？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只有浅薄的应付方法，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浅近些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类，有时而不凑手，怎样办呢？倘使你只会按照一定的样子做，就要束手无策了。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随时变化。桌面上是要安放东西的，所以要是个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状是正方的，长方形的，正圆的，椭圆的，甚而至于都不是的，却不是顶紧要的条件。普通的桌、椅，总是四只脚，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则只要安放得牢，三只脚也未尝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够撑定在中间，也未尝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只脚呢？这是举其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况较活动的事？何况所应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则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够知道呢？那史学家有一句名言道：“现在不能说明现在。”为什么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呢？那是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我们要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经历等等造成的。我们试再反躬自省：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我，岂不和我所生长的家庭，我所肄业的学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从事的职业，都有很大的关系？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里，在别的学校里肄业；我所交往的朋友，换过一班人；我所从事的职业，也换成别一种；我岂能成为现在的我？我们再放眼纵观：我们所认得的人，为什么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

腐气；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这是为什么？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然则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和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和朝鲜不同；就中国的社会，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长思了。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觉得不成问题。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固然，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总不能真正寻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毕竟要好一些，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说：你的话是对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们如何能尽记，亦且如何能尽知？这话不错。一天的新闻纸所载，奚啻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几万万分之一；历史的所载，又奚啻新闻纸的几万万分之一；我们能知道什么？历史又何从谈起呢？且慢，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在社会上，占如何一种位置？人家如何应付你？你没有不明白的。我们所以能够明白这些，岂不由于已往的记忆？然而我们已往的事，我们亦何尝能尽记？然则我要明白我之所以为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牢，只要记得其“足以使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事情”就够了。在人如此，社会亦何独不然？又何至于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记呢？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了。

二、历史的历史

任何一件事，非追溯其已往，不能明白其现在；任何一件事，求其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极远；而又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这种说法，看似微妙，其实是容易明白的。问题就在：“对于已往的事情，要把其使现在成为现在的，挑选出来，而我们现在所挑选的是否得当呢？”这话就很难说了。须知历史，亦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自然发生、成长之物，并不是自始即照着理想做的；更不是人类自始就有甚么高远的理想。说到此，则我们不能不一一考究所谓历史的

历史了。

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起来,历史的起源是很远的,所以一开卷,就是些荒诞不经、渺茫难考的话。其实历史比起人类的年龄来,是很小的。人类的年龄,假定为五十万年,则历史的年龄,大约不过其百分之一;而且比较可靠的,还至少要打一个对折。我们对于已往的知识,自不甘以此为限。所以在没有历史的时代,也要想法子把它补作起来。因此,有所谓历史时代和先史时代。所谓历史时代,是当时的人,有意把它当时或以前的事,记载下来,传给后人,而其所传者,至今还有存留的。所谓先史时代,则这种遗留之物,已无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是后人补作出来的。历史的流传,原不以语言和文字为限,然由语言或文字流传的,究居其极大部分;语言和文字,从广义上说起来,原即一物,文字不过是语言的扩大而已,然语言非借文字,不能传诸久远;所以从大体上说,亦可以说:历史时代,大略和有文字的时代相当,先史时代,则属于未有文字的时代。

历史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呢?据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下列几种:(一)国家所设立的记事之官,即所谓史官所记的。其中又分为:(1)记事之史。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春秋》。(2)记言之史。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尚书》。此系就整部的体例言,若记事、记言之史,零碎材料存于古书之中的,则不可胜举。又《春秋》为记事之史,《尚书》为记言之史,亦系就其大体言之,其中亦自有不能划一之处,如《禹贡》即并非记言之体。总之,古书编纂错乱,体例总不能尽纯,不可十分拘泥。(3)古代的法、令、章程之类。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礼》。小的为一事的仪式,如《仪礼》所记是;大的则可以关涉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及法令的全般,古人亦称为礼,如《周礼》是。后世之《唐六典》,即系仿《周礼》而作的,明、清《会典》,又系仿《唐六典》而作的。(4)贵族的世系,古称为帝系、世本,简称为系、世,但世本亦是它的通名。所以《世本》这部书,内容亦兼记帝王的统系。系、世的记载,据《周礼》,系小史之职。(5)古人自记其功勋,或记其先世功勋之作,即所谓金石刻。金属的寿命,尤较石为悠久,故古器物存于后世的,以金为尤多。(二)私人所传述的故

事,或伟大人物的言行。以其起于口耳相传,故其后虽笔之于书,而仍称为语。传述一件故事或一个人的言行的。都谓之语。前者如武王克商之事,《礼记·乐记》称为《牧野之语》是。后者如《国语》,是分国编纂的语;《论语》论同伦,类也,此书乃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被分类编纂的。《史记》的列传,其原本实称为语,所以在他篇中述及,尚称之为语,如称《淮阴侯列传》曰《淮阴侯语》是。大抵士大夫所传述的,其所关涉之事较大,其说亦较近情理;农夫野老所传述的,则正相反。但要考见当时社会的情况,以及较古的情况,反宜于后者求之,一人士大夫口中,就被其以“言不雅驯”四字删去了。四字见《史记·五帝本纪赞》。中国的神话,颇觉贫乏,其原因即由于此。中国的神话,惟《山海经》及《楚辞》的《离骚》、《天问》等篇,包含较多。其见于纬书的,看似丰富,然多出后人伪造,至少曾经过改造,不甚可信。

历史的缘起,从心理方面说来,可以说:(一)属于理智方面。因为人类有求知的欲望,所以(1)属于无可解释之事,亦要给它一个解释,神话的起源即如此。(2)要记录已往之事,以做将来办事的根据或参考,国家设立史官的根源,就在于此。(3)要记录已往的事。以作后人的法戒,其说已如第一章所述。(二)属于情感方面。不论什么人,都有一个恋旧而不忍忘记之感情,所以要把自己的经历,或他人的事情,是他认为有意义的,传述下来,留给后人。有这两种动机,历史就诞生出来了。但是古人对于主客观的分别,不甚清楚。所以(一)其所流传,真正的事实,和自己的意思,往往混合不分,甚至全篇的话,都是以意构造的,和现在的小说一般,而亦用记事的形式,流传下来,此即所谓寓言,最易使事实淆混。古代所谓小说,乃谓其出于街谈巷议,而不出于士大夫,说见《汉书·艺文志》。事实出于虚构,如后世之小说者,古人谓之寓言。后世的小说,情节虽经理想化,事实或有根据,然其人地名等,则必非真实,故不易与事实相混。古代之寓言,则正相反。情节出于虚构,而人地名则多用真者,如《庄子·盗跖》篇,欲寓其“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成”的理想,乃捏造一孔子欲说服盗跖,反为所大骂,几至遇祸之事,即其一例。(二)更古的人,则连生物和无生物、人和动植物的区别,都弄不清楚了,所以又有所谓神话。(三)就是

述及制度,也是如此的,孰为当时实有的制度?孰为传述者的理想?二者并不分开。记制度者,以儒家之书为最多。儒学分今古文两派,今文言制度者,以《礼记》的《王制》篇为总汇,古文以《周礼》为大宗,皆系如此。诸子书言制度者,以《管子》为最多,亦系如此。所以古代的史实特别模糊。这种性质,大概秦、汉之际,是一个界限。在汉朝初年以前,历史所传的,如赵高指鹿为马之事,如流俗所谓鸿门宴的故事。见《史记·秦本纪》及《项羽本纪》。都是说得天花乱坠,极有趣味,而细想一想,就知道其万无此理的。其可信的程度,决不会超出后世的《三国演义》之上。秦、汉之际,尚且如此,前乎此者,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所谓古史,实当别为一科,专门研究。因为研究的人,各有专长,而古史的研究,有需于特别技术者尤多。至某书或某书的某部分,是否当属于古史的范围,则当以其是否具有此种性质而定,不能执时代为断。从汉朝统一天下以后,文化发达,传述者的程度骤然提高;可靠的材料,流传下来的亦多,前乎此者,采取不足信的材料,亦不能为其人咎。因为历史是不能造作的,断不能以自己推想所信的,作为史实。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的材料,自只能照其原样,传给后人。而采取它的人,原并不以为可信,所以既采取之,而又加以辨正者亦甚多。历史便焕然改观了。

史学的发达,不能不为物力所限。古代作书的材料,简牍笨重,缣帛价贵,而书写又烦难,于是乎(一)著作难;(二)材料之搜辑亦不易。所以能成立一部巨著的,非依靠国家,得其助力不可。司马谈、迁父子世为史官,即其一例。但自隋以前,作史的人,虽借国家的助力,而其事则仍系私人的事业。虽然有时候编成某一朝的历史,系出于国家的命令,亦都就有志于此,或业已从事于此者而命令之,国家不过给以某种助力而已。时代愈后,则(一)材料愈多;(二)所关涉的范围亦愈广,从分量和门类两方面而论,都非一人之力所克胜,唐时遂开集众纂修之例,此后就沿为故事了。可参看《史通》的《古今正史》、《史官建置》两篇。其唐以后的事,可以参看本书的《史通评》。向来论史学的人,多数偏袒私家著述,而贱视集众修纂,这亦是一偏之见,其实二者是各有所长的。如《晋书》系集众所修,其纪、传的凌乱和琐屑,诚不能为讳,然志却是好的,即由聚集各专家,各用其所